



文艺批判

第6期

1967.11.

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

《文艺批判》编辑部

毛 主 席 最 新 指 示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羣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羣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目 录

在邓小平的“无害文艺”背后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 (1)

打倒在文艺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活阎王陆定一

.....本刊编辑部 (4)

斬断周揚一伙伸向魯迅博物館的黑手

.....魯迅博物館紅色造反队 (9)

黑老K巴金的反革命咀臉.....聞 之 (12)

何其芳把持《文学評論》的罪行 文学研究所 文长征 (16)

“少掌柜”李准的“雜貨店”賣的是什麼貨？

.....新北大公社 万木紅 (21)

打倒彭賊 砸烂《怒潮》

紅 七 首

.....北京军区空軍部队五好战士 邵胜珍 (25)

矮脚虎能唸佛嗎？ 两 知 (25)

齐白石是什么样的“艺术大师”？

.....首都美術界批判齐白石聯絡站 (30)

把黑画家陈半丁揪出來示众人民美術出版社門市部燎原兵团 (28)

《讀者來信》斗私批修改造舊的藝術趣味于克訓 (26)

文藝界斗批改簡訊 (3)

最近发现一里魯迅珍貴新手稿

打倒反党作家周而复

定价：一角二分

在邓小平的“无害文艺”背后

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

多年以来，党内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直在同台演出反革命的政治双簧戏。不但他们从各方面诋毁光辉的毛泽东思想，丑化我们伟大的党，向帝、修、反百般讨好，频送秋波；而且在宣扬“无害文艺”论方面，也是完全一唱一和，通力协作，且看：

一个说：“要根据有益、无害的、销得掉的原则，大量印旧书”；“剧目，凡是无害的，都可容许演。”

另一个说：“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等等，只要没有方向性错误，就可以出版、放映、演出，不要过多吹毛求疵。”

一个说：“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可进口”，“改良主义不怕，无害即行”。

另一个说：“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社演，那个也不社演。”

一个说：“看戏之后能得到休息，使人高兴，就很好。”

另一个说：“以后不要总演象《白毛女》一类哭哭啼啼的戏，要演些使人高兴的戏。”

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个提出什么，一个赶忙呼应。两个反革命丑角，一出反革命活剧！

要说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二号人物，其本领就限于与人呼应，没有一点“创造”，那未免委屈了他。“无害”文艺的发明权虽然属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但是，真正把这一修正主义政策“原则”加以“理论化”，并以资产阶级司令部“总管家”的身分竭力贯彻，这个“功劳”应该归于邓小平。请看他在一九五九年旧中宣部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上讲的一段“名言”：“文艺作品有三种：一种是有利的，一种是有利的，还有一种是虽然没有什么益处却也没有害处的作品。这种无害作品也需要，不能排斥。”这俨然是为提倡“无害文艺”树立“理论”根据。他还给“无害作品”下了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所谓“无害作品”，就是没有什么思想性”的作品，“像国画里的山水、花卉、翎毛，以及有些歌舞，等等。”正是在邓小平这样亲自出马、直接督阵之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国文艺领域里各种以“无害”名义孽生的毒草蛆虫才大量出笼，喧嚣一时。

邓小平的“无害文艺”论究竟是什么货色，他所谓的“没有什么思想性”，“没有什么益处却也没有害处的作品”究竟又是些什么东西？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不是对无产阶级有益的作品，就是对无产阶级有害的作品，不是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性，就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性，二者必居其一。所谓中间的“没有什么思想性”的对各个阶级都“无害”的作品，是地球上根本没有的，是彻头彻尾的欺騙。邓小平的“无害文艺”论，实在并不新

鮮，并非是重演早已批判過的“文艺与政治无关”的“超階級”畫調，是“全民文艺論”經過一番巧妙打扮之後的大拍賣了。

事實上，一接觸具體作品，鄧小平之流連口頭上掛着的那點似乎對各個階級都一視同仁的所謂“無害”的遮羞布，也都早已撕得干乾淨淨。歌頌工农兵、歌頌大躍進的作品，總該算是“無害”了吧，然而不，它們畢竟觸犯了鄧小平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尊嚴。鄧小平對林默涵說：“我堅決不看大躍進的影片，寧願看香港片。”他對於以勞動人民為主角、直接為工农兵服務的《白毛女》異常反感，而對《抓壯丁》這樣丑化勞動人民、宣揚地主階級惡劣消遣的影劇，反倒稱美不已。對比之下，他的反革命感情色彩實在何等鮮明，何等強烈！這一切，難道不正好說明鄧小平鼓吹的“無害文艺論”，實際上也就是反工农兵方向論！同那些反對歌頌工农兵及其新英雄的所謂“寫實主義論”、“歷史主義——廣義的唯物論”和“寫中間人物論”完全是一個毒根上生長出來的毒瘤！

鄧小平特別要我們“演戲只演兵，只演打仗的”；說我們題材“狹窄”，說大躍進作品“單調”，看後不能叫入“輕鬆”和“高興”。在他心目中，才子佳人戲演得最多的川劇，才是“文明”的高峯，是所謂“豐富”“耐看”的“無害文艺”的范本。受他支持的修正主義文艺大頭目周揚，更是明目張膽地叫嚷：“在艺术的題材、体裁、風格方面，最大的範圍是只要為人民服務，對人民無害，不是反對人民的东西，都可以存在。不能認為，為工农兵服務非以工农兵為題材不可。題材不能講死。”顯然，鄧小平之流是在借所謂“無害”的幌子，鼓吹題材的自由化，壯草木虫魚、風花雪月、身邊瑣事、儿女之情以至反党的清官厲鬼、騷人墨客塞滿作品，充斥舞台。他們竭力鼓吹的“無害文艺論”，實際上又是文艺黑綫的另一一些代表性論點——“反題材決定”論和“反火药味論”的變種！

鄧小平還在“允許無害作品存在”的名義下，對革命的文艺批評、文艺思想斗争進行了種種污蔑。他胡說我們的文艺批評是“吹毛求疵”、“扼殺創作”。攻擊我們“這個不許演，那個也不許演”，弄得人“不敢寫文章了”。說什麼“过去的思想改造是东风压倒西风，是壓倒的，現在需要證理”。甚至惡毒地誣陷革命的文藝批評工作者“就是想靠着批評別人出名，踏着別人肩膀自己上台”。而按照他們的方針，為了“廣開文路”，假說就必須大力提倡“無害文艺”。無須贅述，鄧小平這一套，又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的“創作自由”論，是為形形色色毒草和牛鬼蛇神立下的護身符！

在前几年掀起的京劇革命的偉大浪潮中，鄧小平之流所鼓吹的“無害作品”論，更是对抗和游離这个运动的挡箭牌。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早就宣稱：“旧戲不要改。有害留改，無害不改。”他还提出了實際上計京劇永遠演历史戲的所謂各個劇種的“分工論”。鄧小平則在“好的历史劇目可以增長人們的智慧”這一幌子下，一九六〇年前後連續向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下了几道黑指示，說什麼“旧劇历史戲最多，你們可以設法找人从三皇五帝編起，一直編到近代史”，“編他三百六十本，一天演一本，可演一年”。企圖让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死人洋人在一年三百六十天中能够天天霸占舞台。就在主子直接授意之下，鄧的牌友、反共老手吳晗不久就拋出了一个所謂《历史劇綱目》，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也在他們炮制的《劇院（團）工作條例》中明文規定：“只要内容在政治上無害……

而在艺术上具有特点，为群众所喜爱的剧目，都可以上演。”这些孤草狗党相互勾结起来，竭力破坏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指示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运动。邓小平等人就对京剧革命进行疯狂攻击，说什么：“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但演就是不好看”，“新编好的不多，以后还会有些戴吧！”就是这个家伙，在同他的反革命伙计彭真到山东时，对山东京剧团准备为他们演出革命现代戏《奇袭白虎团》大为不满，在开演前半小时下令停演，并亲自点了吕剧才子佳人戏《姊妹易嫁》和《搬窑》，看完之后还和演员一起照相，尽情地赞扬了一番。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暴露了邓小平一伙提倡“无害文艺”的反革命面目，暴露了他们千方百计抗拒京剧革命、抗拒文艺革命的狼子心肠。

由刘少奇所“首倡”而由邓小平所“发挥”的“无害文艺”论，就是这样一伙儿同文艺黑线的各个代表在论点都有紧密联系的极端反动的理论。由于它打着“无害”的招牌，经过一层伪装，有点迷惑力，因而他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种十分危险、毒害极大的理论。鲁迅说得好，“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自觉不出这二死的无稽来。因为这是‘砍刀子’。”“无害文艺”论正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砍刀子”。它是掩护各种毒草和牛鬼蛇神的一块盾牌，是对党内最大的无产主义道路权威推行和平演变、腐蚀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很厉害的手段。今天，当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阶级斗争正在以过渡时期的新形式激烈地进行着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牢牢掌握政权的同时，更必须时刻警惕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司令员抛出的“无害文艺”这类反动理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最近发现一批鲁迅珍贵新文稿

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一批鲁迅的珍贵手稿。其中包括书信二十封，杂文一篇。这些都是从未发表过的。

鲁迅未发表过的杂文手稿，是一九一八年写的，题目标明是“随感录”。“随感录”是当时《新青年》专登社会评论的专栏，鲁迅在这里发表过很多战斗力极强的杂文。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当时非常热爱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同情和支持在斗争中的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鲁迅大力介绍这些作品热望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这篇手稿是在钱玄同的藏书中发现的，当时没有发表。

在鲁迅未发表过的书信手稿中，有一封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写给钱玄同的长信。信中表示他坚决支持《新青年》，严厉抨击了当时想反对《新青年》的反动思潮。这有力地证明了鲁迅在“五四”前夕就是一个在馬列主义影响下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驳斥了周扬黑帮污蔑鲁迅在“五四”前完全是“害脑”、“彷徨”的翻言。

（艾大海）

打倒在文艺界实行资产阶级 专政的活阎王陆定一

本刊编辑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正确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一方针进行了最粗暴的践踏、歪曲和篡改，以便在文艺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这一罪恶活动中，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思想文化部门的代理人、旧中宣部閹王殿的头号閹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就是一个罪魁祸首。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修改”马克思主义的罪行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遗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在歪曲、篡改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跟他们的祖师爷考茨基使用的是同样卑劣的手法。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陆定一发表连篇累牍的讲话，以谈“双百方针”为名，贩卖了大量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在这些讲话中，他大放厥词，肆意阉割“双百方针”的革命内容，抹杀“双百方针”的革命精神，使“双百方针”这一无产阶级的坚定的阶级政策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变成刘少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工具。

—

什么是“双百方针”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呢？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双百方针”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开展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对一切毒草和牛鬼蛇神进行批判和斗争，在批判斗争的风雨中间，发展马列主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同时，通过批判和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正是从这些根本方面，对“双百方针”进行了可恥的歪曲和篡改。

毛主席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就是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毛主席正是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反复指出：在社会主义

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是，陆定一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故意抹杀阶级斗争的事实，把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说成是提出“双百方针”的前提，明目张胆地篡改“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条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了”，因为“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强”。他一九五七年五月在旧中宣部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得更为露骨了，他说：“放得不得了怎么办？不会的，因为阶级已消灭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正是陆定一在那里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正在磨刀霍霍，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呢！陆定一故意掩饰这一阶级斗争的事实，不过是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掩护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

毛主席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特别强调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要对毒草和牛鬼蛇神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但是，陆定一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许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进行批判斗争的。他既是资产阶级的奴才和走狗，又是资产阶级的护法神。他生怕触动资产阶级一根毫毛，大骂批判资产阶级是“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宗派主义”，“垄断想法”，“清规戒律”，“思想僵化”，帽子可謂多矣；胡说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很容易搞成一家独鸣，脑子就僵化，理论就不行，学术就倒退。”他指责我们“提出的口号好像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还气势汹汹地教训说：“不能把资产阶级都打倒！”真是一副奴才相。在他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批判资产阶级是绝对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批判的，牛鬼蛇神是不能消灭的，必须把这些“宝贝”供养起来，以免他们在中国绝了种。这自然使得我们想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四九年在天津的一段话：“同志们在天津，好象不知不觉把自由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这就错了”。那么，谁才是斗争对象呢？请看他对资本家说的知心话：“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不能怪共产党不好。”两副面孔，相映成趣，一副资本家走狗的可耻丑脸暴露得淋漓尽致，真是妙不可言。陆定一之流跟他们的主子唱的是同一个奴才调。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但是，陆定一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借口“双百方针”，以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为名，拼命要取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他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进行攻击，实在令人不能容忍；他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咒骂毛泽东思想“是标签”“到处都贴”，叫嚣“不能提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来研究什么学。”真是何其毒也；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旧中宣部讨论文艺工作的会议上，他胡说什么：“文艺批评也不

要千篇一律，不要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搞得干干净净干什么？文艺批评搞得象孔庙，旁人沒有份。”这是什么話，这是公开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退出文艺批评陣地，让資本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去占领。这真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老实告訴你，陆定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陣地，就是要把你这些牛鬼蛇神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是沒有你們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份！要说“孔庙”，你們这些革命黑司令部才是真正的孔庙，你統治的田中宣部閻王殿才是真正的孔庙。在那里，你們实行资产階級专政，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位置，你們这不是孔庙是什么，在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他的每个細胞，每根血管，每条骨髓，都渗透了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浪，都充滿了对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刻骨仇恨，我們一定要全党共誅之，全国共討之！

陆定一就是这样把“双百方針”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内容一笔抹煞，閹割尽淨。

二

陆定一用了大量混乱不堪的詭言，对“双百方針”进行别有用心地随心所欲的歪曲和篡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变来变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把“双百方針”变成资产階級自由化的政策，为资产階級、修正主义、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大开綠灯，鼓动他們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資本主义复辟。試看陆定一的反革命謬論：

其一日：“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对批評工作說來，就是批評的自由和反批評的自由。”自由，自由！然陆定一象着了魔似的修養“自由”的時候，他却故意採用了自由的階級內容。在階級社會里，从来就沒有抽象的自由，超階級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階級的自由。“双百方針”決不是像陆定一所歪曲的那樣“自由化”的政策，毛主席規定了鑑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標準，这就告訴我們，在社会主义的百花园里，只有放香花的自由，沒有放毒草的自由。当然，毒草和牛鬼蛇神是客觀存在，它們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方法頑強地表現自己的，我們应当讓它們出來，但讓它們出來是为了批判，为了斗争，为了鋤掉它們，決不是讓它們自由泛滥。“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灭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敵人在和毒草、牛鬼蛇神的斗争中，就会增強辨别能力，提高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决不是“自由化”，这是按照階級斗争的規律，因勢利导，聚而歼之。这是彻底的唯物論，彻底的辯証法。陆定一的話是一九五六年五月講的，在当时階級斗争日益尖銳，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前夕，他这样大喊大叫“双百方針”就是要“自由”，他究竟是在为誰呼喚“自由”呢？螞蟥一出洞，預示着风雨的来临，陆定一的叫嚷，正是为资产階級右派向党进攻制造輿論。果然，五七年右派进攻时就打出了“自由、民主”的破招牌。联系到陆定一閹王殿在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下，一貫压制左派，包庇右派，陽攻暗反禹同志《評李自成自述》的革命文章，对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历史劇‘海瑞罢官’》这样一篇重要的战斗文章不准轉載，千方百計扼杀江青同志嘔

心瀝血培植起來的革命樣板戲和功勳，他們給予自由，對誰專政，不是清清楚楚了嗎。撕開面皮，露出本質，陸定一所鼓吹的“自由”，不過是資產階級放草的自由，是對无产阶级實行專政的自由。

其二曰：“什麼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統一戰綫。同資產階級左派和中間派的統一戰綫。”這真是對“雙百方針”的極大歪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要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開展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在思想戰綫上，不是无产阶级占領陣地，就是資產階級占領陣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在這里是決不能搞統一戰綫的。如果在思想上和資產階級搞統一戰綫，那就是放棄无产阶级思想的領導地位，背叛无产阶级，可恥地向資產階級投降。陸定一所宣揚的“統一戰綫”，就是向資產階級投降的政策，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統一”到資產階級方面去。毛主席一九五四年在《關於紅樓夢研究會的一封信》中，就严厉批判了那些“大人物”“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应当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应当對他們投降。”毛主席所批判的“大人物”，就是中國赫魯曉夫和陸定一之流。

其三曰：“什麼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黨領導下的團結。”就是“各顧互相學習，互相批判，互相團結，”“互相合作，互相尊重”。他還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你駁我，我駁你。”你聽他多公平啊，不偏不倚，公正之狀可掬，一副正人君子的面貌，這裏還有階級鬥爭，哪里還有是非之分！說穿了，這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動口號。對於這個資產階級的反動口號，毛主席作了最深刻的批判，他說：“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无产阶级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毛主席說得何等深刻啊！這就給我們最明確地指出了階級鬥爭、階級關係的實質，擊中了陸定一之流的反動口號的要害。什麼“互相學習，互相批判，互相團結，互相合作，互相尊重”，見鬼去吧！難道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之間可以“互相學習，互相團結，互相工作，互相尊重”嗎？陸定一的“互相尊重”，就是要无产阶级放下武器，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陸定一的“互相學習”，就是要用資產階級思想毒蝕无产阶级，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无产阶级。

陸定一還以“雙百方針”為名，大力推行“反題材決定”論的反動詭計。他說：“題材可以不限，古代的和現代的，中國的和外國的，让它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什麼“題材可以不限”！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必然满腔熱情地歌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你就必然表現工农兵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鬥爭生活；你是資產階級文艺家，你就必然去表現資產階級腐敗的生活，歌頌資產階級的沒落人物，二者必居其一。陸定一不是說“題材不限”嗎？請看他不限的是些什麼題材，他限制的又是什麼題材吧。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就叫喊要打破“工农兵題材”這個“格轡”；一九六一年七月，他嫌文艺“修”得还不够，指責文艺表現的“全是馬列主義者”，沒反映出“投機倒把，貪

污、阿飞”来，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說：“鴛鴦蝴蝶派的，容許他搞”，这“也算一桩”；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又說：“中間人物可以写，包括神仙、鬼、寓言都可以写”。很明白，陆定一咀說“不限”，实际是“要限”的，他不限的只是鴛鴦蝴蝶，中間人物，神仙鬼怪，投机倒把，流氓阿飞，而独独要限制工农兵题材和馬列主义，这就是他的“反题材决定”論的反动本质，就是这样一個反动透頂的論調，一直被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們奉为圣旨，一九六一年文艺报的《题材問題》专論这株大毒草，就是根据这个反动理論炮制出来的。

只要留心看看陆定一的讲话，就会发现一个妙奥，那就是，凡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就是他讲“双百方针”最多的时候，凡是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最猖狂的时候，就是他讲“双百方针”最起劲的时候。只此一点，陆定一所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底是为谁效劳，他要誰来“放”，要誰来“鸣”，他要放的是什么，他要鸣的又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嗎？

陆定一有一段臭名昭著的“名言”，那就是他在一九六四年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說的：“現在两个传下去，馬列主义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传下去；两个万岁，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真是无耻到了极点；这种叛徒行徑，真使一切新老牌修正主义者望尘莫及了。其实，他哪里是要两个传下去，他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思想传下去，他哪里是要两个万岁；他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思想万岁。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奔走呼号，这就是陆定一的“天职”，他歪曲、篡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口号，正是为他这个反革命目的服务的。

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怒涛，把旧中宣部这座閻王殿冲垮了，陆定一这个閻王也被革命人民从宝座上拉下来了。历史的辩证法将那些抗拒历史潮流的“庞然大物”提到革命人民的审判席前，接受历史的裁判，充当人民的反面教員，陆定一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員，他从反面給我們上課，使我們永远不忘阶级斗争，永远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我們要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鋤草大軍，把中国赫魯晓夫刘少奇和陆定一之流这些反革命大毒草統統鋤掉，鋤掉这批毒草，以后还会有毒草出土，还要再鋤。毒草鋤掉以后，社会主义香花就会茂盛地成长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中，放射出灿烂的異采。

斬斷周揚一伙伸向魯迅博物館的黑手

魯迅博物館紅色造反隊

長期以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打着“紀念”魯迅的幌子，千青推銷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貨的勾當。中國赫魯曉夫在文藝界的忠實代理人周揚直接把他黑手伸進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利用它公開篡改歷史，惡意歪曲、貶低魯迅的偉大形象，借以達到攻擊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罪惡目的。下面我們就揭發周揚一伙在魯迅博物館陳列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瘋狂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魯迅是毛主席的偉大戰友。魯迅最熱愛毛主席。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充分表露了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崇敬的心情。同時，又正是毛主席，對魯迅的歷史貢獻，作了最正確、最全面、最充分的評價。

但是，令人萬分憤慨的是，周揚一伙精心經營的魯迅博物館，在八百多平方米的陳列面積中，竟然沒有一幅毛主席的畫象；相反，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什麼姚王勾踐、國民黨軍閥陳炯明、大叛徒、洋教授、老秀才、三十年代文藝黑線人物……，卻通通被當作正面形象，充斥其間。全部陳列從開始到結束，總共有八條毛主席語錄，而且還是作為史實的說明詞和背景材料出現的。相反，他們卻把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網領《左聯執委會決議》製成巨幅語錄，擺在顯著地位。他們還從大叛徒瞿秋白的文章中摘出語錄，並且說“代表了黨對魯迅的認識，了解和推崇”，妄圖和毛主席分庭抗禮。顯然，周揚一伙這樣做根本不是紀念魯迅，而是徹底地背叛魯迅，瘋狂地反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

惡毒歪曲和攻擊魯迅

周揚一伙一貫以“紀念”魯迅為名，行歪曲和攻擊魯迅之實，在這個展覽中，他們更加明目張膽地對毛主席對魯迅的正確評價，拼命往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臉上抹黑。

毛主席指出：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但是周揚之流為了達到貶低魯迅的卑劣目的，竭力否認魯迅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周揚公然叫嚷：“他（魯迅）究竟不是一個政治活動家”，“不要把他發展成為一個革命活動家”。他別有用心地投意這個展覽“要表現魯迅是文學家”，“把魯迅在學術研究、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都表現出來”，而不註表現作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魯迅。田中宣部另一個閹王胡乔木也說什麼“表現生活和文學創作的活動，不具體，也不生動”。“就不能吸引觀眾”。周揚的黑手將王冶秋對於王子的旨意心領神會，提出“文學博物館的特色”就是“要分析他的作品，以這些材料來教育人民”的謬論。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在魯迅的“生活和文學創作的活動”方面大作文章，要表現所謂魯迅的“善人面貌”，實則片面宣揚魯迅“繼承文學遺產”，“教育兒童”等等，力圖把魯迅歪曲成為封建文藝和資產階級文藝的繼承者，保衛“世界和平生活不受毒害”的

和平主义者。他们对鲁迅“毁灭”进化论思想，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感兴趣，轻描淡写，而对大量古碑、佛像、山水画着意渲染，企图让人们相信鲁迅仿佛是一个脱离现实斗争的有闲阶级。真是恶毒之极！

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这个展览却用大量篇幅和版面别有用心地宣扬和美化鲁迅出身的地主家庭和他幼年所受的封建文化教育，不厌其详地介绍他家的港口、台门、房子和封建私塾，把这些表现成鲁迅成长中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力图把鲁迅表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封建文化的忠实奴隶，而丝毫不表现鲁迅对他所出身的剥削阶级的彻底背叛和对封建旧文化的彻底批判。

在上海的十年（1927——1936），是鲁迅战斗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形形色色的御用文人，混进左翼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对鲁迅进行了疯狂的“围剿”，但结果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周扬一伙极力缩小鲁迅在这一时期文化战线上的丰功伟绩，同时却把鲁迅的功劳据为己有，记在周扬之流所控制的“左联”名下。在说明词中就大言不惭地写道：“左联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在激烈的斗争中，仍然被左联所击溃”，等等。展览的炮制者还利令智昏地把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和鲁迅的战斗文章并列，突出展览，把周扬捧为“党的代表。”周扬这伙恶鬼，在鲁迅生前是鲁迅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在鲁迅死后，又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鲁迅，死命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卑鄙无耻之极！

妄图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翻案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

可是，那时左联的某些领导人，现在的周扬之流，却一直阴谋翻案。他们控制的鲁迅博物馆就成了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翻案做舆论准备的阵地。他们利用这个博物馆狂热地鼓吹左联的“实绩”，用最大型的镜框展出左联的纲领及其活动，用塞满几个大陈列柜的刊物，来显示其“功绩”。在当时，实际上只有以鲁迅为首的斗争的左翼文艺运动才是代表了正确路线的，可是他们对此却极力回避。

三十年代后期两个口号的论争，实质上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斗争。周扬一伙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周扬之流为了颠倒历史、打击鲁迅，竭力阻挠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论题》这篇光辉的战斗论文的原稿在鲁迅博物馆展出。周扬作贼心虚地说：“这篇文章不要陈列，有些问题说不清楚，需要有充分的材料，细致的研究。”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鲁迅的这篇论文痛斥了周扬之流“国防文学”口号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两面派的鬼脸皮袍和反革命的真面目。

在一次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周扬恬不知耻地说：“当时我们工作也有缺

点，沒有团结好鲁迅。”儼然以党的領導者自居，而誣蔑鲁迅是不服从党的領導的，自外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周揚之流为了歪曲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形象，就是这样不惜篡改历史，使尽种种卑劣手段。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配合苏修反华

毛主席說：“利用小說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在鲁迅博物館，周揚則是精心匠測地摘取鲁迅文章中的片断，肆意歪曲，断章取义，以諷晦的手法发泄其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

展覽中这样的鲁迅語录不胜枚举：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之后不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騙，变成了他們的奴隶了。”

“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这可咒詛的地方，由退了这可咒詛的时代。”

躲在阴沟里的周揚們，为了发泄他們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企图通过广泛摘取鲁迅批判当时黑暗现实的語录以达到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真是癡心妄想！

在一九六二年黑云翻翻之时，周揚还串通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和鲁迅博物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大右派錢曉鈺的一幅黑画卷《鲁迅故乡撒謊》塞进了博物館的基本陈列里，“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还在这幅黑画卷上，題了一首极为反动的跋詩，剑拔弩张地叫嚣什么“三十余年烽火后，血花染就自由衣，”流露出对党的刻骨仇恨。

出籠于一九六一年国内外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复杂的时期的鲁迅博物館黑陈列，还直到配合苏修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在展覽中大談其“中苏友好”。这个主题在这时大大充实、增加内容，列为专题表現，而且还增加了一个主题材料，显然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全部陈列中最大的巨幅中心語录写道，“我們反对进攻苏联，我們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魔鬼，无论它說着怎样甜膩的話头，持着怎样公正的面孔。”（《我們不再受騙了》）

这段話鲁迅写于一九三二年。那时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綫一边，坚决支持和保卫斯大林同志領導的苏联紅色政权，表现了鲁迅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問題在于，三十年后的一九六一年，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已徹底反了斯大林、斯大林的革命事业，在苏联进行了全面资本主义复辟，他們勾結美帝国主义瘋狂地反华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仇敌，在这个时侯，展覽却大叫“友好”，大搞“中苏复交”的祝賀电报，而且特意增加一个主題材料，借鲁迅的話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射出一支支毒箭，周揚之流的反革命面目不是暴露无遺了吗？

欠債总是要还的。我們一定要彻底清算周揚一伙在鲁迅博物館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把鲁迅博物館办成宣传毛澤东思想的紅色陣地而奮斗！

“黑老K”巴金的反革命嘴臉

聞 之

巴金，是文艺界数一数二的资产阶级反动臭“权威”，是閻王殿吹捧的响噱噱的三十年代“老作家”。他在解放前所写的许多作品，狂热地鼓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替地主阶级树碑立传，大唱挽歌，贩卖反动透顶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黑货，是一批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之大成的货真价实的大海草。这些毒草，真是不知摧蚀和毒害了多少中国革命青年！

可是，解放以后，在刘少奇、周扬的包庇之下，巴金却戴上了三十年代“进步作家”的桂冠，窃取了上海文艺界和作协主席的宝座，一方面，继续翻印他的那些毒草，编了又臭又长的文集，销行国内国外，成为周扬鼓吹“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的一副王牌，其害人之深，流毒之广，真是罄竹难书；另一方面，他又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勾结牛鬼蛇神，推行文艺黑线，一次又一次地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犯下了累累罪行。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反动“权威”揪出来了。这里，我们把巴金的反革命嘴脸拿出来示众。

巴金为什么叫“巴金”？

巴金原名李芾蕃。后来才改成叫巴金（B·K）。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巴金远在二十年代就是反动透顶的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崇拜者和鼓吹者。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曾津津有味地翻译了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来跟马列主义思想唱反调。他对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能做他们的忠实信徒而自豪，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不要了，因此才抛弃原名而取了巴枯宁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合起来为“巴金”。可见巴金跟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结下了多么深的不解之缘。

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巴金不仅是无政府主义的虔诚信徒，而且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出身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他从来背叛自己的阶级。对地主阶级家庭血腥的剥削生活，他是多么的留恋，又是多么的向往啊！他在三十年代写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是一部为地主家庭树碑立传的黑“家谱”。

到了六十年代，当我国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上地主反坏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搞恶毒，妄图复辟的时候，巴金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也跳了出来，以谈“创作”为名，替他的地主官僚的老爷、少爷、叔叔、哥哥们树碑立传，大续起李氏的家谱来了。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谈自己的创作》，便是这样一本黑书。

请看巴金对他官僚地主家庭的祖传三代是怎样描写的吧：他的祖父，做了多年的官，买了不少田地，修了公馆，搜藏了古玩字画，讨了两个姨太太，对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劳动

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巴金是那樣滿含深情地為他唱贊歌，說什麼“我的祖父雖然又保守，又頑固，但是並不愚蠢。”他津津有味地描寫他的叔叔們荒淫無恥的生活，欣賞他們尋歡作樂的“才能”：“我的三叔雖然在外面玩小旦，搞女人，抽大煙，可是他寫得一手好字，又能詩能文，也熟悉法律”。“我五叔……長的清瘦，人又聰明，……在短促的時間里，他學會了許多事情。嫖、賭、吃、喝、無一不精，……文章的確寫得不錯。”

巴金在書中常提到的大哥，是一個地主分子，他是巴金一房的管家，一貫依靠出產榨取勞動人民血汗，後來又從事高利貸剝削，因投機破產而自殺。對這樣一個老吸血鬼，巴金居然不厭其煩的吹噓他，給他塗脂抹粉，連篇累牘地摘引他的“遺囑”，把他打扮成一個善良的受害者，甚至公然稱他是“我一生愛得最多的人”。這真是無恥之極；巴金在這本書中宣揚的完全是劉少奇那套“剝削有理”，吸血無罪的反動哲學。

巴金為這個劉文采式的官僚地主家庭大續家譜，其目的是為地主階級招魂，妄圖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這種反革命野心，不是一清二楚的嗎？

漏網的大右派，反黨的急先鋒

一九五六年，正是匈牙利發生反革命暴亂，國際上修正主義思潮泛濫，國內階級敵人蠢蠢欲動的時候，巴金也忽然做起“夢”來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寫了一篇題為《秋夜》的雜文，借着紀念魯迅之名，發泄了對黨對社會主義刻骨的仇恨。他誣蔑社會主義社會“黑得象一盤墨汁”，說什麼他“在真理面前”不“退却”，“在暴力面前”不“低頭”，“為了追求真理”要“敢說、敢做、敢罵、敢恨、敢愛”，他按捺不住對新社會的仇恨，感到了一種“獻身的慾望”。巴金紀念魯迅是假，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是真。

為了實現他復辟資本主義的美夢，巴金確實“獻身”出來，對黨和社會主義發動了猖狂的進攻。

一九五六年，他用“余一”的筆名，寫了許多反黨的雜文，對黨和社會主義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和誣蔑，真是發揮了他的“敢罵”“敢恨”的精神。在一篇《論“有啥吃啥”》的大毒草里，他對當時市場供應情況被盡誣蔑之能事，說：“中秋節的早晨在一個菜場就有兩位排隊的婦女當場暈倒，社救護車來救了去”，發泄了他對現實的極端仇恨的情緒。

在另一篇《“艱苦”和“浪費”》的毒草里，他誣蔑我們市場上的供應方式是打著“艱苦朴素”的招牌，替不合格的產品或次貨推銷路，惡毒地攻擊上海節日招牌樓是“奢侈浪費”，該好像非搭幾座大牌樓不足以表示今天的新上海局面似的。”

在市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他提出了“把文藝還給人民”的反動口號，叫囂什麼“應該把文藝交給人民，送到羣眾中去受考驗，不能由少數領導同志根據自己的好惡干涉上演或出版。”陰謀把黨和人民對立起來，妄圖取消黨對文藝的領導。

一九五七年三月，巴金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講話。可是，巴金回到上海后，不但沒有貫徹主席指示和會議精神，反而在上海市召開的作家座談會上，勾結一羣牛鬼蛇神，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右派分子傅雷、許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西彥、資產階級反動“翻譯家”羅祿南都在會上狂妄叫囂，大肆放毒。巴金也赤膊上陣，跟他們一唱一和。羅祿南說黨領導的出版社權力太集中，掌握了稿件的生殺大

权，是“一花独放”，巴金马上附和說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只此一家”，沒有“社会主义竞赛”，有的作品因此就“見不得天日”了。巴金在会上还极力为曾經受过批評的“混世魔王”赵丹、反党杂文家林放和他自己的毒草《論“有啥吃啥”》等进行辯护。

当时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若望，以作协党组书记身份来上海参加會議的黑帮分子邵荃麟等，在会上也都支持巴金等人的反动謬論。

这是閻王殿和上海黑市委有組織有计划向党进攻的一次黑会。巴金在这个会上扮演了一个极可恥的角色。

撕去周揚之流給巴金披上的“进步老作家”的画皮，巴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漏网的大右派，反党的急先鋒。

叛徒法斯特的辯护士

在以赫魯晓夫为首的現代修正主义向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大叛卖的时候，原美国共产党作家法斯特宣布退出共产党，成了不恥于人类的狗叛徒。革命群众对这个历史的小丑进行了憤怒的声討。可是巴金却在一九五八年第八期《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法斯特的悲剧》的文章，千方百计地为法斯特辯护。巴金胡說他的背叛是因为“知識分子心灵深处有一个偉大的自己”，因为对革命不满意，才“一赌气轉身就走”了。在文章中，巴金如丧考妣地說，从此世界上失去了一个“誠实的作家”，法斯特再也不会写出“激动人心的誠实的作品”来了，真是不胜惋惜之至。最后还滿含深情的呼吁法斯特“回头是岸。”

“黑老K”巴金为什么如此卖力地替法斯特塗脂抹粉，为他的叛徒罪行辯护呢？原来，巴金自己就是一个道貌地地的修正主义者。他跟赫魯晓夫、法斯特完全是一丘之貉！

周閻王保护过关，“黑老K”反攻倒算

解放以后，巴金非但不对自己作品中鼓吹的反动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反而百般为它辯护。一九五八，他在《談〈灭亡〉》等文中，公然把无政府主义吹嘘为共产主义，把无政府主义者打扮成革命者，揚言他的《灭亡》不是歌頌虚无主义的小說，而是“歌頌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

这些鬼文章一出籠，姚文元等同志就立刻給以迎头痛击。全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紛紛起来，掀起了批判巴金作品的热潮。巴金見了十分脑火。他赶紧向黑主子周揚訴苦，周揚对这个被他封为“語言艺术大師”的巴金，自然是爱护备至，急忙出来保护，一面安慰巴金，一面禁止批判巴金的专集发行，公开鎮压革命群众的批判，保护巴金过关。

巴金受到批判以后，一直怀恨在心，伺机进行反扑。一九六一年，时机来到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巴金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他編第十四卷黑《文集》时，一方面偷偷地把最露骨的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动观点的黑話刪掉了，一方面連篇累牋地抛出諷刺性經驗的文章，繼續吹捧他那些大毒草，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扑，甚至把这些东西拿到香港报纸上去发表。他在《談〈新生〉及其它》一文中，竭力为自己开脫，說自己仅仅是